

# 从日本人巴蜀游记看四川教育变革的特点

房 锐 黄义华

【摘 要】清代末年,进入巴蜀地区的日本人用异域者的眼光,对四川的教育进行审视和评价,并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献材料。从明治维新实行教育改革并取得成功的经验出发,他们在看到四川教育发展的同时,更多地认识到了改革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,发现了四川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,这对于研究四川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。考察这些日本人撰写的游记,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,更为深入地认识清末四川教育变革的特点。

【关键词】 日人;游记;四川教育;变革特点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207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008-0139(2017)02-0030-5

清末日本人撰写的巴蜀游记,是日本人从异域者的角度出发,对巴蜀社会所作的踏查记,其内容较为丰富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等各个方面。由于巴蜀游记的作者,多为在新式学堂中任教的日本教习,而兴办教育是四川发展的重要内容,因此,教育成为日本人重点关注的一大版块,大至清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,小至学堂课程的设置等,其巴蜀游记都有所记载,这就为研究清末四川教育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材料,补充了许多本土文献所没有的细节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## 一、新旧交替

自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以后,大力兴办教育成为四川发展的主要内容,四川教育由此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,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,如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开始出现,旧

式的书院和私塾也逐渐为各级各类学堂所替代,普通教育、专门教育、实业教育、女子教育等遍及省内各处,报刊图书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。然而,从整体上看,四川地区虽然建立了新式学堂,订立了新的学制和管理办法,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,但是四川的新式教育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彩,尤其是在教育宗旨上,呈现出了鲜明的新旧交替的特点。日本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并在其游记中进行了论述。

中野孤山在《横跨中国大陆——游蜀杂俎》中说道:“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贵、尚武,此五条,乃大清国教育之宗旨,也就是其教育之本意和目的。……孔子乃无冠之王,其宝德之盛,可穷尽天地。事实令人感到,与其说是中国的孔子,不如说是孔子的中国。”<sup>[1]</sup>可见,传统忠君、尊圣观念仍处于新式教育的首要位置。事实上,清政府实施新政,进行教育改革,其本身就是建立在维持旧

〔基金项目〕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“清末民初外国人巴蜀游记研究”(项目编号:SC14E007)阶段性成果。

〔作者简介〕 房 锐,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、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四川 成都 610068;  
黄义华,泸州市江阳区综合电子监察中心工作人员,四川 泸州 646000。

统治,维护传统礼法的基础上的。1904年,清政府颁布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明确指出:“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,以忠孝为敷教之本,以礼法为训俗之方,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。”<sup>[2]</sup>规定:“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。初等、高等小学堂,以养成国民忠国家、尊圣教之心为主。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,一概毋庸另习洋文,以免抛荒中学根柢。必俟中国文义通顺,理解明白,考取入中学堂后,始准兼习洋文。”<sup>[3]</sup>引入的新文化、新知识仅是求生致用的工具而已,而忠君、尊圣观念的教育才是第一位的。

据中野孤山《横跨中国大陆——游蜀杂俎》记载,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崇,在兴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,四川省内每一个学堂里“一定设有祭祀孔老夫子的圣坛,这已成为华人道德观念的中心点。……圣坛要安放在学堂最神圣的礼堂”<sup>[4]</sup>,而学校的“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或其他的学校庆典大多在这位万世师表——圣人孔子的灵前举行”<sup>[5]</sup>。山川早水在《巴蜀》中也记叙了他参观小学堂时,众人祭拜孔子的场景:“学堂中央有一座礼堂,供奉着孔子的牌位。每天早上上课前校长率领学生跪拜在孔子的牌位前。这种做法不只是小学,这个国家的各个学校大多如此。”<sup>[6]</sup>虽然实行了教育改革,但是祭孔的传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,尊孔教育贯穿了整个新式教育的始终。

除了上述平日生活中的小祭祀外,日本人在游记还重点记载了春秋仲月上丁之日,四川举行的大型祭孔典礼。这是每年四川地区最重要的祭祀之一,整个活动的过程都遵循隋唐以来的祭礼,有专门的释奠定式和乐章,过程十分复杂。值得注意的是,关于释奠活动,四川文人并没有引起重视,本土文献中关于释奠的资料也较少,而日本人在对四川教育进行探查时,却注意到了这一传统,并在游记中记载了祭礼的全过程。如山川早水在《巴蜀》所录《释奠》一文中,采取文字记叙和图表说明相结合的方式,对祭孔仪式进行介绍,内容比较详尽。

其一,山川早水对参与释奠的人员进行了说

明。祭祀祭官是由四川总督带领的文武百官,祭官等级较为分明,分工也很明确。祭礼对参观的人员也有一定的要求,山川早水记载:“我在成都期间,想参观一下这样的仪式,因典礼前给我来了邀请函,才有幸有容身的位置,在那里可观看中国本国的孔子祭典。”<sup>[7]</sup>“我们登上东面的阶梯,站在殿门旁边,等待典礼开始。”<sup>[8]</sup>可见,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观祭礼,山川早水等人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日本教习的身份,获得了邀请函,得以在殿门旁有一席之地,而一般的普通民众是没有资格的。

其二,山川早水对祭坛的规制、排布等具体情况也做了介绍。“祭坛由石头筑成,高五尺,长六丈四尺,宽五丈八尺。祭坛两侧有两个台阶,坛前是大成殿。”<sup>[9]</sup>“坛的两端立有庭燎一对。燎由芦竹捆成束作成,径约八九寸,高约两丈。”<sup>[10]</sup>“作为供品的佳肴之壮观,实可看出大国的风度。剥了皮的巨牛就那么摆在俎上(俎高四尺余),头朝神位方向。供牛只限于对孔子,其他为猪羊各一只,猪羊也都是剥了皮的整猪整羊。虽不如牛,但也不失壮观。”<sup>[11]</sup>关于祭坛上各礼器的具体陈设情况,山川早水在游记中还辅以图表进行说明,其图表对祭坛的排布情况做了细致、直观展示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其三,山川早水描述了释奠活动的流程。山川早水从自身经历出发,记叙了他参加祭礼的全过程,“祭典从凌晨三点开始,我等三名日本人换了装束,天黑去了文庙,暂时在庙外的旧成都府学署等候。不久向导出来,把我们领入庙门。……巳时祭奠开始。大成殿门顿时全开。……四川总督为初献,他身着朝服,从东边的台阶登上,入殿跪拜孔子。司祝手捧祝版,诵祝文。拜毕退出,由西边的台阶下。布政使以下的大官为亚献、终献,全依次进殿,只拜配哲两位,退出,由西边的台阶下。如初献一样,这期间,按照规定开始奏乐,歌生唱歌,舞生起舞。初献时跳宁平舞,司节唱颂章,歌生和之,舞生伴舞。……亚献的时候跳安平舞。……终献的时候,跳景平舞。……舞生左手执

龠，龠长一尺四寸，上有三个孔。右手执翟，其柄长一尺四寸，其首上刻有龙；其口里衔着雉尾三根舞之。司节先唱曰‘觉’，歌生齐和之，舞生随式舞之。其次唱曰‘我’，再次曰‘生’，唱曰‘民’。一唱一舞，直至爰斟三正才算完毕。安平、景平皆如此。……就这样三献各三拜之后，祭礼完毕，殿门立即关闭，总督以下的官员立即退出庙堂。”<sup>[12]</sup>整个祭礼大约持续一个多小时左右，其中的每个环节，都严格遵照释奠仪注进行。

总之，从山川早水的记载可以看出，释奠仪式十分隆重，其对参与人员身份的要求，对祭坛设置、排布以及仪式流程的规定等，都显示出清政府对孔子的尊崇。其后，慈禧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十一月十五日颁布懿旨，称：“孔子至圣，德配天地，万世师表，允宜升为大祀，以昭隆重。”<sup>[13]</sup>下令升孔庙祭祀为大祀，使其同天、地、宗庙一样享有最高祭祀规格，更是将尊孔教育推向了顶峰。正是出于维护统治、豫定民志之故，尊孔教育实际上成为新式教育最核心的内容，这使得教育变革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的烙印，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新旧交替的特点。

## 二、层级差异不分明

日本人在探查四川教育时，除了注重从整体上审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状况外，还重视从具体的入学资格、授课内容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对教育进行考察。通过日本人在游记中的相关评价可知，层级差异不分明是清末四川教育变革的又一突出特点。

其一，学生的年龄层级差异不分明。关于各级学堂学生的入学年龄，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中指出，出于初办新式学堂，暂行从宽变通之故，“年至九岁、十岁者（即是满八岁满九岁），亦准入初等小学”<sup>[14]</sup>，中等学堂“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、文理明顺、略知初级普通学者亦得入学”<sup>[15]</sup>。并进一步规定，“俟学堂开办合法五年后，即不行用”<sup>[16]</sup>，“年岁过长者即不许入中学”<sup>[17]</sup>。然而，从日本人巴蜀游记的相

关记载来看，四川的教育变革并没有体现出阶段性，各级学堂在学生的年龄上，差异并不分明，实际办学情况同《章程》规定相去甚远。山川早水在《巴蜀》中记载：“既有十六岁读高等学堂的，也有五十二岁读高等小学的。在日本如果一个已经有儿孙的老人还当小学生，那简直就是新闻的话题。但在中国人之间，彼此都不觉得奇怪。不管目的是什么，他们彼此不问对方的年龄。”<sup>[18]</sup>

其二，在西学知识的接受和学习上，各级新式学堂层级差异也比较小，没有形成梯度，正如《横跨中国大陆——游蜀杂俎》所载：“高等学堂与中学堂的学生所修课程相差无几。”<sup>[19]</sup>究其原因，日本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一方面，这或与学生的知识水平有关，“在过渡时期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他们在进入现在的学堂之前，除汉文书籍以外，什么也没有学过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讲义非常精彩，《史记》《左传》等读解也绝顶透彻，但关于理化、常识、数学等知识，他们却一窍不通”<sup>[20]</sup>。清代末年，最先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，是在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人，教育改革前，他们的学习主要是在各义学、社学、私塾以及书院中进行的。出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科举考试的要求，在教学内容上，各书院大抵不出儒家经典和宋儒学说等一系列文献。《四川省志》载：“清末，生徒除读四书五经外，还须读《圣谕广训》《圣谕》《御制补笙乐》《圣谕广训演义》。选读下列书籍：《四书解义》《朱子大全》《名教罪人诗草》《学政全书》《新编学政全书》《周易折中》《明史》《书经传说汇纂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天章炯戒》等。”<sup>[21]</sup>儒学在教学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，学生接受的文化相对单一，知识面也比较狭窄，缺乏基本的西学常识。

另一方面，各级新式学堂学生的选拔方式，“根据诗文写作的好坏来定”<sup>[22]</sup>，这也限制了西学教育的展开。在教育改革初期，新式中小学堂毕业生相对较少，各中等、高等学堂不得不调整其入学要求，选取具有经学、史学或算学根底的科举儒生入学。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班，

就专为熟悉儒经、诸史、词章之学,具有贡生、廪生等功名,年龄较大的学生而设。通省师范学堂招收的学生,“由各属考选保送,大县三、四人,中县二、三人,小县一、二人,不论举贡生监,年在十八岁以上,四十岁以下,品行端正,无嗜好,无疾病,中学确有根柢者,定为官费师范生”<sup>[23]</sup>。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,成为教育改革初期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的考核标准,因此,“虽然学堂的层次各异,但除了汉文书籍,其他的学问,其程度几乎是一样的”<sup>[24]</sup>,学生需要重新学习一般的西学原理,教学内容层级差异极不分明。

### 三、教育发展不平衡

除新旧交替、教育层级差异不分明外,日本人还注意到了四川省内各地方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特点,并在游记中多方面、多角度地进行了记载。

山川早水《巴蜀》在对四川教育变革进行记叙时,已经有意识的从地域上将四川教育划分为两个部分,即“成都的教育”和“省内的地方教育”,并分别进行了说明。关于成都的教育,其文曰:“明治三十八年(1905年)十一月,在成都练兵场举行运动会,城内公私各学堂都集中到这里。学校数达到三十七校,学生总计为二千八百二十一人。”<sup>[25]</sup>而在1906年6月,“除上述三十七所学堂外,又成立了铁路学堂、中央师范学堂、淑行女塾以及其他两三所学堂,学生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三千人”<sup>[26]</sup>。事实上,从人数上来讲,成都的学生数量虽然位居省内前列,但并不是最多的。到了1909年,据清学部公布的《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》,四川省内涪州、巴县、梁山、江津、合州、安岳、仁寿、富顺等十五地的学生数量均超过了成都。然而,从学堂的种类来看,成都地区无疑是省内最完备的。据《巴蜀》所述,最迟在1906年,成都地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,其中既包括进行普通教育的高等、中等及小学堂,也包括进行专门教育的师范学堂、军事学堂以及各初级、中级实业学堂等。

反观同时期省内的地方教育,据山川早水记

载,“小学堂虽然不太够,但各府县一般都有”<sup>[27]</sup>,但是“中学堂、师范学堂在全省(除成都外)不过有几所。……省内中等教育的普及究竟等到何时?看来遥遥无期。”<sup>[28]</sup>可见,四川省内各地方的教育与成都相比,还有着较大的差距,虽然地方官员大力兴办新式学堂,但也仅仅普及了小学教育,而进行中等教育的学堂还比较少,更别说建立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了。从上述日本人巴蜀游记的记载可以看出,成都和省内各地方的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。

除了地域上教育发展不平衡外,山川早水还谈到了教师资源不平衡的问题,其文曰:“具备一点学堂意识、有资格的教员担当教育者仅限于城市所在地。至于穷乡僻壤,在一个古庙内由村里的夫子教授《三字经》的学堂,连我国江户时代的私塾都不如。……正在首府学习的师范生分配到这样的村邑各地,可能还要等到遥远的未来。”<sup>[29]</sup>

四川教育改革初期,适应新式学堂教学的师资还比较匮乏,他们多分布于各府、州、县等地,较为偏远的地区,仍然由仅接受了传统教育的夫子担任。虽然,在新式学堂上任前,这些夫子会接受一定的培训,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,但由于自身西学基础薄弱、培训时间短等原因,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,他们并不能同专门的师范生一样,真正适应教育的变革,二者在教师素质水平上,是不平衡的。

师资的不平衡也表现在日本教习的分布上,据山川早水统计,1906年5月,成都各学堂的日本教习人数共计16名,而其他各地方的日本教习人数仅有12名<sup>[30]</sup>。成都的日本教习人数竟然超过了省内其他各地教习人数的总和,师资分布不平衡由此可略见一斑。山川早水还指出,四川引入的外国教习,在各国人数所占比例上,也是不平衡的,“教员有中国人,也有外国人。外国人中日本人占主要部分,人数也远超过西洋人,一时使日本教习的势力骤增。此时,有的学堂还请他们作兼职。更甚者,有的竟以日本教习作为招牌吸引学生。西洋教习,当时就我所知,有英国人一名,美国人一名,

法国人一名,还有四五名其他国家的人。”<sup>[31]</sup>日本人在外国教习中占有绝对的优势,其人数远超过其他西洋国家的教习,因此,他们常以四川教育的推进者自居。山川早水认为:“明治三十六年(1903年)开始招聘我们日本的教习,这应该是成都的教育新旧交替的界限。此前可能是西洋传教士的私塾,此类尚不足以列入教育沿革史中。”<sup>[32]</sup>正是由于日本与西洋教习在人数比例上的不平衡,日方占有较大的优势,山川早水等人在游记中才有这样的说法。

最后,日本人还观察到,四川省内各学堂在发展程度上也是不平衡的,这尤其表现在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。山川早水对四川早期的女子教育进行了记载:“四川的女子教育仅有两所相当于高等小学程度的女子学校,可以作为代表了。一是成都的淑行女塾,一是泸州的泸州女学堂。淑行女塾是成都的有志者共同创立的,有学生三十人左右。”<sup>[33]</sup>事实上,1906年前后,四川地区相当

于高等小学的女子学堂并不止上述两所,但从整体上看,女子教育的发展程度还比较低,学堂规模小,教育能力也非常有限。而日本人关于男子教育的记载就比较丰富,这表现在:学堂种类繁多,包括师范学堂、军事学堂、法政学堂、工艺学堂、体育学堂等;学制系统完备,既有蒙学院,也有小学堂、中学堂、高等学堂等,整个系统学习年限共计二十一年;学堂规模也相对较大,“学校学生最多的是四百人”<sup>[34]</sup>。总之,男子教育得到了地方的大力支持,各级各类新式学堂迅速兴办起来,而出于风气才开等缘故,虽然已经有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女子的教育问题,但女子教育仅“初见其萌芽”<sup>[35]</sup>,“更显幼稚”<sup>[36]</sup>,两者发展极不平衡。

综上,面对四川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,日本人以教育变革成功者的身份,从新旧交替、层级不明显以及教育发展不平衡三个方面,对变革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审视和探讨。这些记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,值得重视。

#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[4] [5] [19] [20] [22] [24] [36] 中野孤山著,郭举昆译.横跨中国大陆——游蜀杂俎[M].中华书局,2007.142-143,119,142,145,145-146,146,146,146.
- [2] [3] [14] [15] [16] [17] 陈元晖主编,璩鑫圭、唐良炎编.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(学制演变)[M].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7.495,501,302,326,302,326.
- [6] [7] [8] [9] [10] [11] [12] [18] [25] [26] [27] [28] [29] [30] [31] [32] [33] [34] [35] 山川早水著,李密,李春德,李杰译.巴蜀旧影——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[M].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5.12,102,104,102,102-103,105,102-105,90,90,90,91,92,91-92,82,90-91,89,92,90,92,.
- [13] 朱寿朋.光绪朝东华录[M].中华书局,1958.5607.
- [21]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四川省志·教育志[M].方志出版社,2000.78.
- [23] 学务处开办通省师范学堂简章[J].四川学报,1906,(3).

(责任编辑 王怀成)